

人口控制与人口素质“逆淘汰”

Birth Control and Counterculling of Population Quality

侯东民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80年代,出于对人口素质的关切,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相同的人口政策下,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城镇平均生育水平一般为1.4,而农村则高达约2.7,二者相差近一倍。此外,在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生育水平一般也相对低于欠发达地区。据此,人们产生了一种忧虑,人口控制将导致人口素质的逆淘汰。这一忧虑甚至在人口学界内部也有反响。

笔者认为,尽管上述生育率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观点却值得商榷。实际上,它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分析这一问题,必须先回答下面两个问题。没有人口控制,是不是仍然存在人口素质“逆淘汰”?人口控制对人口素质“逆淘汰”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推波助澜,还是起抑制作用?受资料限制,本文侧重对表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一个标志——城乡生育率差距的分析。

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已经拉开,已存在人口素质“逆淘汰”

事实上,人口学者非常清楚,生育水平与文化经济水平一般总是反向相关的,这是生育行为一般性的规律。当今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差异导致城乡生育水平差距也是规律性的。不论是否实行人口控制,城乡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都已存在。从西方国家看,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依靠城市化过程不断缩小农村人口的比例,另一方面依靠现代农业发展,缩小城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

我国从1974年开始在农村实行人口控制。早在此以前,城乡生育差距已经拉开,人口素质已经存在“逆淘汰”现象。1970年,我国城市平均生育水平是3.2,农村是6.3,二者相差已经几乎一倍;1973年城乡生育率分别为2.4与5.0,相差一倍

以上。当时的生育率差距与80年代情况大致相当,但对人口“逆淘汰”的忧患意识却产生于80年代。为什么?这一方面表明我国人口素质意识在80年代有很大进步,另一方面又暴露了这种意识仍有朦胧性质,有其不确切的方面。很显然,把所谓“人口素质逆淘汰”当成新问题,并且把它归因于人口控制,这是欠妥当的。

至于农村实行人口控制以前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形成的原因,凡熟悉中国城乡人口相对生育比例变化情况的都非常清楚,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我国城乡生育率差距甚微。以后二者逐渐拉开,至1970年大约已成1:2的格局。另外,从人口控制看,农村人口控制始于1974年,城市人口控制宣传教育1964年就已经开始,这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70年代1:2的格局是否是城市人口控制先行的结果。如的确如此,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上述论点,是成立的。

关于60年代我国城市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国内外人口学者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城市生育率的转变在60年代基本上是个自发过程,尽管不能否认城市人口控制宣传教育起了一定作用。鉴于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论,做一些简要分析是必要的。

可以认为,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城乡生育率基本持平,因素是复杂的。但总的来看,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城乡生育水平拉开才是必然的。到6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市经济文化发展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约束生育率的机制业已成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制约作用相对更强。这样,60年代中后期城市生育率开始转变,这是很自然的。我国城市约束生育水平机制最有力者是以下几个因素:

1. 城市医疗保健事业发展较快,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

解放前全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到80年

代初全国水平已降到大约50%，但城市在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水平。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从一个重要方面降低了生育水平。

2. 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城市就业方针，并且把妇女解放与妇女参加工作相联系。

到1957年城镇地区妇女已基本充分就业。以后，除60年代初有小的波动外，城镇妇女就业率一直很高。妇女从事社会生产后，初婚年龄提高，(1952~1970年全国初婚年龄提高了1.3岁，而城镇则提高了2.6岁)，初育年龄必然推迟。照看孩子时间减少，造成总的生育水平降低。这就是人口学中所说的，妇女就业对减少生育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低工资”对城市生育率也具有强有力的约束作用。60~70年代年轻双职工二人工资合计一般仅有70~80元，1978年以后才开始改变。即使不计算老人的赡养费，以1970年城市平均生育水平3.2计，或以1973年2.4计，以这样的工资水平，一个家庭要维持5.2或4.4个人的生活，应该说已经较为拮据。多生因之也受到了强烈限制。

3. 以上几个因素综合作用。

由上可见中国城市约束生育水平机制相当强化。再加上时代发展，文化水平提高，年轻人观念也在变化，城市生育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城市人口控制宣传教育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十年动乱中，各级行政领导受到很大冲击，计划生育宣传工作陷于停顿，但此期间城市生育水平总的讲没有上升，反而加速下降。1965年3.8，1966年3.1，1973年降至2.4。这一事实充分说明1974年全国实行人口控制前，我国城市生育水平降低具有自发的性质。换言之，1973年以前，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城市人口控制先行的结果，而是城市自发性人口转变的结果。

二、人口控制对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的影响

关于1974年以后人口控制对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产生的影响，不能只看城乡生育率绝对数值的变动，而应看1974年前后城乡相对生育率的比较。如果从绝对数值看，城乡生育水平由1973年的2.4与5.0分别下降到80年代的1.4与2.7，绝对差距显然大大减少了。

但从表1和图1给出的我国城乡相对生育率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图，显然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70年代我国的人口控制对人口素质“逆淘汰”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表1数据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但仍能看到一般规律。总的讲，1973年以前

主要因为城市生育率下降，城乡生育水平逐步拉开。城乡相对生育率值50年代基本是1.0到1973年已提高到2.1左右，形成了人口素质“逆淘汰”。

表1 中国城市和农村总和生育率及比值 (1950~1982)

年份	城市	乡村	比值
1950	5.3	5.29	9981132
1951	5.136	5.289	1.029790
1952	5.683	6.038	1.062467
1953	5.51	5.705	1.035390
1954	6.041	5.935	9824532
1955	5.67	6.048	1.066667
1956	5.403	5.651	1.045900
1957	6.165	6.213	1.007786
1958	5.452	5.506	1.009905
1959	4.36	4.204	9642202
1960	4.195	3.94	9392133
1961	3.13	3.313	1.058466
1962	4.911	6.2	1.262472
1963	6.341	7.645	1.205646
1964	4.416	6.496	1.471014
1965	3.779	6.526	1.726912
1966	3.101	6.905	2.226701
1967	2.899	5.776	1.992411
1968	3.797	6.938	1.827232
1969	3.301	6.196	1.877007
1970	3.206	6.313	1.962998
1971	2.831	5.963	2.106323
1972	2.589	5.43	2.097335
1973	2.362	4.975	2.106266
1974	1.944	4.623	2.378086
1975	1.759	3.966	2.254690
1976	1.604	3.605	2.247506
1977	1.571	3.143	2.000637
1978	1.575	3.001	1.905397
1979	1.401	3.1	2.212705
1980	1.196	2.563	2.142977
1981	1.474	2.988	2.027137
1982	1.499	2.857	1.905937

资料来源：《Basic data on fertility in the provinces of China, 1940~1982, A. J. Coale and Chen Sheng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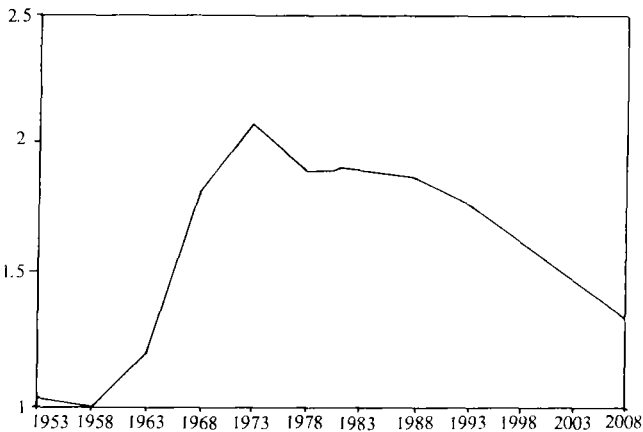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城乡生育率比值变化趋势 (1953~2008)

资料来源：部分数字取自表1。
1988年以R/u=2.7/1.4计算
1998年以R/u=2.3/1.4计算
2008年以R/u=2.3/1.7计算。

1974年,全国范围实行人口控制后,城市人口控制效果相对较快,较好。到1979年,城市生育水平已经降到1.4左右。这基本可以看成是现行政策下城市人口平均生育水平的低限。直到今天,这一数值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农村人口控制效果相对于城市则有渐进的性质。同样是1979年,农村生育水平才下降到3.1。既没达到当时“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政策的要求,距80年代一孩政策要求相去更远。但是,从绝对数值看,1973~1979年农村生育水平下降了约1.9,城市生育水平却仅下降1.0,二者又基本保持了2:1的水平。

这样,按表1资料计算,实行人口控制后,1974~1979年,城乡相对生育率平均值为2.17,比1973年2.11的水平略有上升,但差异甚微,乃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城市生育水平因人口控制影响而下降最快的70年代最后6年中,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格局也并没产生令人注目的变化。当然上述2.11是这6年的平均值。1974年由于城市人口控制动作较快,这一相对值一度升到2.38。但从第2年又开始回落。

2. 人口控制在80年代已初步发挥减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作用。

从80年代起我国人口控制面临的基本形势是,城市人口控制已经基本达到目的,农村人口控制仍有较大潜力可挖。城乡相对生育水平的变动已基本取决于农村生育水平的变化。因此,从80年代开始,如果我国人口控制工作是向前走,而不是向后退,农村生育水平及城乡相对生育率必定将不断地下降。换言之,从80年代起我国人口控制将开始发挥其减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作用。

但整个80年代,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和70年代相比,我国农村生育水平仅下降了0.3~0.4。农村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中后期一直徘徊于2.7~2.8之间,城乡相对生育率值可估算大约在1.9~2.0的水平。和1973年的2.1相比,其减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作用并不引人注目。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80年代人口控制加剧了人口素质“逆淘汰”。

3. 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人口控制对减缓“逆淘汰”的功能将显著增强。

9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控制可望进一步取得进展。城市生育水平预计仍基本保持不变。具体些讲,笔者估计,90年代人口控制使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可降到2.3,甚至可能降得更低。这一估计与我国目前人口规划大致一致。因此,可以预计,城乡相对生育率90年代有可能进一步降低到1.7~1.6水平。与1973年的2.1相比,90年代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可望有令人注目的可喜的变

化。

下世纪初,本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将进入婚育期。根据以往防止人口老化的人口战略设想,以及根据现行各地计划生育条例(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届时这批人将被允许生育二胎。农村生育水平预计那时或保持不变(80年代农村独生子女比例甚小),或从2.3左右仍有所下降。这样,可以预言,由于政策因素影响,城乡相对生育率值在21世纪初由于城市生育水平的升高而将进一步显著地下降。城乡生育水平更为靠近。城乡相对生育率值可望进一步下降到1.4,甚至以下。

4. 如果没有人口控制,城乡相对生育率将如何变化

以上分析说明人口控制实际上对减缓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反过来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人口控制,情况会怎么样?城乡相对生育率值是不是同样在此期间会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回答是否定的。

我国社会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引起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一问题对人口增长实际有很大影响。根据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在观念上,以及经济文化水平上较迅速发展情况,加上上已述及的“高就业、低工资”等因素今天仍在发挥影响,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人口控制,在60~7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基础上,80~90年代我国城市生育率仍会呈显著的下降趋势。事实上,70年代城市生育水平的下降幅度已大大低于政策的要求。这说明即使1974年不实行人口控制,城市生育率转变仍可能继续进行,城乡相对生育率扩大趋势依然存在。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城市生育水平可能继续下降。相比之下,二元结构的另一级——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总的讲7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变化,80年代的变化也相对比城市迟缓得多,生育率转变可能也相对迟缓。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必然导致我国城乡生育结构二元化的趋势相对较为长久。

不必断言,如果没有人口控制,我国城乡生育率必定进一步拉开,人口素质“逆淘汰”必定进一步加重,但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我国二元结构下,如果没有人口控制,今后这段时间内要想较显著地减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不可能或是相当困难的。换言之,人口控制减轻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绩不可否认。

三、应如何看待所谓我国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下转第43页)

技术培植与转移的空间载体形式。它能够以优惠的政策、成套的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信息咨询、金融、法律、税收、货币汇兑等方面的“软”服务,形成较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吸收国内外企业在这一特定区域集中建厂,使高新技术项目实现产业化。从我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现状与问题来看,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成果的高新化,技术项目的快速产业化与市场化。同时,应按照这一要求,设定相应的管理体制。其原则,一是保证开发区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活动具有高效率;二是保证开发区企业能够建立有竞争活力的良性运行机制。

3.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孵化”中心

科技孵化中心亦称科技产业“孵化器”。它是80年代以来在美国、西欧率先发展起来的一种有利于技术转移的新型组织。这种组织一般以高技术“工业园区”为依托,以扶植和“产出”应用科技成果的小企业为己任。它在“孵化”期内为小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使之具有成熟的自营能力后结束孵化过程。据称,利用科技孵化中心的作用,美国曾在三年内使小企业的成功率由50%上升到80%。借鉴国外经验,可在我国沿海和内地的科技实力较强的大中城市中,建立起一批科技孵化中心,通过介绍技术成果,提供高效低租的办公、文秘、通讯、电脑、财会、法律、公关等成套服务乃至帮助筹措创业与发展资金,帮助高新技术产品寻找国内外市场,形成规模经济等。这有利于技术成果的规模化转移。

4. 发展规范化技术市场

技术市场是技术成果转移的中介和“蓄水池”,又是技术进入产业化和商品化的重要渠道。当前,我国的技术市场在经历一个粗放阶段后,应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包括:由非常设市场向常设市场转变;由“介绍服务型”向“参与开发型”转变;由吸收零星、小批技术项目向吸收成套技术项目,包括计划内项目的兼容并蓄方向转变;由单纯技术项目经营向技术经营与金融、招商等活动相结合的方向转变,等等。

四、不断扩大优势技术的外向输出

技术的外向输出是技术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进出口活动中有待加强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相对于初级、原材料产品的出口比重的加大,实物型技术的外向输出得到可喜的发展。此外,一些中间技术项目和“独特”技术项目的出口,也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技术出口额偏低,特别是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先进技术数量更少。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

附加价值高于一般机电产品,一般机电产品则又高于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产品,尤其是可作为许可证贸易对象的信息或知识形态的高新技术,具有更高的附加价值和转让利益。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结构长期低度化的国家,一则不利于国内技术的进步与转移,二则会承受贸易利益的损失。

我国应继续保持和扩大传统产品技术对国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优势,同时逐步加大高新技术的出口份额。从长期来说,更要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和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趋势,长期走智力开发——智力输出的道路,即尽可能地增加智力投资,提高整体技术开发能力,更多地生产和出口技术密集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包括在我国有巨大开发潜力的计算机软件产品,从而扩大和提高我国在世界技术转移格局中的所占的比重与层次。

当前,技术输出需要把握的战略要素包括:

(1) 选择好出口时机,输出太早势必削弱自己的后继的市场优势,输出太晚则会因技术过时而失去需求,根据国外经验,应选在产品进入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之际较为合适。

(2) 在出口技术的同时,注意带动成套设备和部分产品出口,以减少或避免技术出口对相关产品出口市场的冲击。

(3) 争取以技术入股、跨国开办合资企业的形式,避开贸易壁垒,使产品直接进入国际市场。

(责任编辑 冷远猷)

(上接第57页)

辩证法主张对事物一分为二,世界上任何事情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发展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也这样。前已述及,文化水准与生育水平反向相关是人类生育行为一般性的特征,对此不必忧虑。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国家发展中出现的这类问题,成为发展的重大障碍。相反,随着进一步发展,随城乡差别缩小、城市化水平提高,这一问题会逐步减缓乃至根本地解决。60年代我国城乡生育率拉开是城市生育率自然降低的结果,这本身是发展和进步,是好事。1974年全国实行人口控制后,我国城乡相对生育水平直至今天大致保持相对稳定,而今后则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过去十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了近十个百分点。在今后一些年中,这一过程可望加速。这样,对所谓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一方面要承认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也应认清前景并不悲观,它不应被认为是我国人口素质发展中重大的、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 肖庆山)